

我和我的祖国 征文
洛阳大美艺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协办

向往

□张守华

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某个三伏天里，万安山南麓，一群农村妇女正在树荫下纳鞋底。这时，一个挑担子的外乡老汉，急匆匆地闯入人群中求助，说是手指上扎了木刺。众媳妇拿针轮流上场却无济于事，疼得他额头直冒汗。最后，多亏了一个大辫子姑娘，才得以解围。老汉竖起大拇指：“闺女，看你天庭饱满、地阁方圆，将来定能说个好婆家，吃上商品粮。”听到这话，大辫子姑娘脸一下子红到耳根，转身跑开了。

后来，经媒人介绍，大辫子姑娘跟邻村张木匠的大儿子定了亲。张木匠为人憨厚，木工活做得好，常义务帮乡亲做工，村里的家具大都出自他手。那年，公社给村里分了个红旗井煤矿招工指标，支书推荐张木匠的大儿子去，消息传来，两家人欢天喜地。谁知，挖煤劳动强度大、危险系数高，小伙子没干几天死活要回来。大辫子姑娘硬是不让。

初冬，伴随着煤矿医院产房里的一声啼哭，一个小男孩降生了，那就是我，那个矿工是我父亲，大辫子姑娘是我母亲。

我打记事起，就常听村里人对我说：“你爸端着铁饭碗，将来你一接班，也是享福的命。”这话我似懂非懂，不过还是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。

80年代末，我们全家人搬到矿上，吃上了商品粮。改革开放后，父亲到市煤炭公司上班。原定他一人到市里，让我们回老家，母亲却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回去太丢人，就是拾破烂、要饭，我也要把孩子们都带到市里！”父亲一咬牙，揣着兜里借来的200元，叫了一辆东风车，拉上全家人、十来只下蛋老母鸡、三五件破烂家具、几只破麻袋，呼啦啦进城了，到达后，一地鸡毛。在亲友的帮衬下，我们在涧河边郊区的村子里落了脚。

一天，在农村开荒的曾祖父从老家来，看见我们一家挤在石棉瓦棚下的可怜光景，沉默半晌后，紧皱眉头说：“城里镇受症，胜回咱老家？！”母亲不怕受症，鼓足劲儿起早贪黑，种菜、养猪扛起重担。她常去村西边建筑垃圾堆拾旧砖，最大的心愿就是像城里人那样住上楼房。不久，父亲下岗了。父母如此艰难，我只能用学习成绩给他们慰藉。读高二那年，我家终于盖起了三层楼房。

填报志愿时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农业大学。谁知，我大学毕业那年，几个妹妹还在上学，患糖尿病多年的母亲却突发中风撒手人寰。

再后来，我家赶上棚户区改造，终于住上了高层楼房，真正变成了城里人；我也历经一路坎坷，通过考试进入市农业部门工作。父亲已经退休，儿孙绕膝，可惜母亲看不到了……

上个月，父亲过生日，餐桌上，他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咱家能有今天，虽然每一步都离不开个人奋斗，但党的领导、国家的发展，你千万不敢忘记！”我又怎能忘记初心？祖祖辈辈的向往我时刻不忘。作为农业部门乡村振兴中的一员，我已投身到脱贫攻坚战中，成为一名贫困户帮扶队员。

英雄纪念碑前

□王超英

仰望你坚毅的面孔，
烽火岁月依旧激荡在心中。
怎能忘那如泣如诉的壮烈，
怎能忘那枪林弹雨的牺牲。
一支支队伍走过来哟，
井冈峰岭点燃映山红浓浓的情。
高举锤头镰刀的旗帜，
我们信仰坚定，
只因为，血脉里流淌着先烈的基因。

凝望你冲锋的背影，
峥嵘岁月常常萦绕在梦中。
怎能忘那波澜壮阔的画卷，
怎能忘那出生入死的英勇。
一支支队伍走过来哟，
黄土塬上开遍山丹丹暖暖的红。
高举理想信念的旗帜，
我们不忘初心，
只因为，血脉里奔腾着英雄的精神。

继续开来追梦人，
我们是青春的方阵，
红色旗帜永远飘扬忠诚，
让光荣和梦想辉映祖国天空。



扫二维码，看征稿启事

出行变迁记

□静言

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。我的成长伴随着祖国的发展，我的生活水平随着祖国的发展强大而节节高升。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，衣食住行日新月异，幸福指数日日刷新。最能体现幸福指数的是出行之变。

1964年，我到县城上高中。家离学校50多里地，我每星期回家一次，拿干粮，背粮食。来回百十里路，靠的是两条腿，我们叫它“11号”。几个同学一起，有说有笑地走，一走就是三年。那时，人们出行全靠两条腿，没有辛苦的概念。

当时，家乡父老追求的是一辆架子车。平常用它干农活，逢年过节靠它走亲戚。我上高中第一天报到，就是父亲拉着架子车，把我们几个人的行李送到学校的。那情景历历在目，念念不忘。

1969年，我参加工作到了城市。单位离婆婆家80多里地，我回家看婆婆都是步行。一次，我和爱人回家，路上遇到大雨，两个人都淋成了落汤鸡。年轻的我们很浪漫，边走边高声朗诵：“漫天大雨，雨里行军情更迫。今行何处，大雨迷漫烟波里。”

1973年，我们有了女儿，回家不能再靠步行了，我们攒钱买了一辆飞鸽自行车。那时，物资紧缺，攒够了钱，还要有票证才能买到。拥有一辆崭新的自行车，在那时是很有面子的事情，骑在路上能吸引许多羡慕的目光。爱人骑着它上下班，带着我和孩子回家看母亲，既风光，又惬意。

后来，我们又有了儿子，自行车就是我们一家四口的坐骑。每逢礼拜天，我们都骑着它回家。女儿坐前面的横梁，我抱着儿子坐在后面。一路上喜气洋洋，心情别提多舒畅了。有一次，大概是太过得意了，爱人一边骑一边唱，一不留神把女儿脚挤到了车轮里。女儿才三四岁，竟没有哭叫。我们心疼自责了好长时间。

那年代，人们很少出远门，整天守着单位，守着家。我也一样，最大的脚程也就是回家那点儿距离。自行车就是当时最先进的交通工具。

1978年五一，我们带孩子坐了一次火车。那时，女儿5岁，儿子3岁。从洛阳到偃师，绿皮车厢，木条长凳。一节车厢里只有我们一家人。两个孩子兴奋极了，在车厢里跑来跑去，一会儿坐这儿，一会儿坐那儿。那是孩子们第一次坐火车，他们兴奋了好久，逢人就说是坐火车了。我也很高兴，好像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。

转眼到了80年代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，社会起了巨大变化，我的生活也随之变化。出行多了，出行方式也渐渐“奢侈”起来。

1985年，我去桂林学习，先从洛阳乘坐绿皮火车到武汉。我第一次知道火车不只有长条木凳，还有卧铺，可以躺下睡觉。躺在卧铺上，我真激动。

1995年，坐软卧到武汉，我才知道，卧铺还有软、硬之分；晚上睡觉，软卧的厢门是可以关上的。那一夜，我兴奋得睡不着，开着铺头小灯看书。想一想，颇有几分显摆。

2005年，我从广州乘坐飞机到海南，再从海南飞回郑州。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，一路上兴奋得不知道谁是谁，以至于把接机的朋友都认错了，惹得老公笑话我像个孩子。我反唇相讥：“跟你结婚这么多年没坐过飞机，是孩子让我坐上了飞机。”他纠正我：“是我们赶上好时代，才坐上了飞机。”

在祖国腾飞的今天，一切“不可能”都成为真真切切的事实。“嫦娥探月”不再是神话，“航母巡海”不再是企盼，“坐地日行万里遥”不再是梦想，普通的退休教师到美国旅游已成为现实。

现在，每年我都会乘飞机或坐高铁出游几次，订好票，拉起箱子就走，潇洒得不行不行的。

回顾几十年来的出行变迁，我深切感到自己是个幸福的人，这幸福正是源自祖国的发展和强大。

